

03451

我 的 一 生

奥古斯特·倍倍尔著

I



我 的 一 生

第 一 卷

奥古斯特·倍倍尔著

薄芝宇译 李稼年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ugust Bebel
AUS MEINEM LEBEN
Erster Teil
DIETZ VERLAG BERLIN 1953
根据柏林迪茨出版社 1953 年版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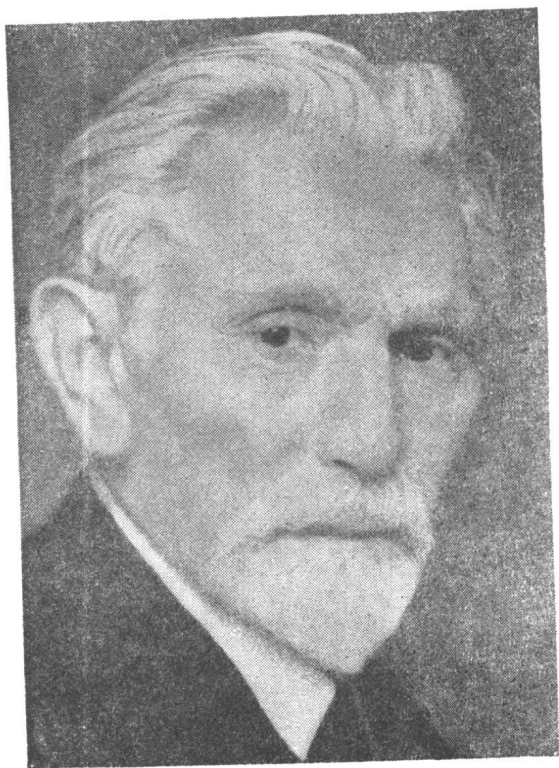
我 的 一 生
第 一 卷
〔德〕奥古斯特·倍倍尔著
薄芝宇译 李稼年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125 印张 144,000 字
1965 年 10 月第 1 版 1978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号 11002·421 定价 0.63 元



August Bebel

出版者說明

《我的一生》是倍倍尔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全书三卷，叙述的时间从倍倍尔的童年直到一八八二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取得初步胜利时止。倍倍尔本来想写到一八九〇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废除，因为他于一九一三年逝世，所以未能实现他的愿望。

在本书所叙述的时期内，倍倍尔在为德国工人阶级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这也反映到本书中来。这里举两个例子，如书中对哥达代表大会上两派合并一事的看法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通过克服拉萨尔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才能实现德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买卖”^①。倍倍尔起先也不同意牺牲原则，但是后来以“统一”为重，竟同意了在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向拉萨尔派作了原则上让步的纲领。又如在叙述一八八一年后由于俾斯麦采取了缓和措施而在工人运动内部助长了右倾机会主义并引起了党内争论时，书中只当作一般的意见分歧看待，说它是由于“各个人的气质和性格，通过对一般情况和自己党派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磨擦和意见争执”，没有揭示这次意见分歧的严重性质，事实上这是党内的一场大辩论，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是大非之争。对这种意见分歧，决不能采取调和的态度，只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三二八页。

有坚持馬克思主义,粉碎右傾机会主义,才符合党的利益。

此外,书中对某些人物的评价不很正确,比如书中对拉萨尔的思想 and 活动虽然有所批判和揭露,但很不够。又比如,倍倍尔在书中袒护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痛恨的赫希柏格。对于希尔施譴責犯了机会主义錯誤的社会民主党議員凱泽尔这一事件,书中不但沒有揭露凱泽尔的机会主义錯誤,反而指責希尔施是出于“私人的仇恨”。

因此,当我們閱讀倍倍尔这部有相当史料价值的著作时,不能不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

原书末有一篇考茨基写的《編者后記》,刪掉不用。

奥古斯特·倍倍尔

弗·伊·列宁

倍倍尔的逝世，不仅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一位在工人中間最有威信、最受群众爱戴的領袖，因为倍倍尔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和政治活动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而且体现了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

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萌芽的时期。无数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进行了长时期的极为顽强的斗争。社会主义正在探寻自己的道路，正在探寻自己本身。刚刚从一般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带有个别爆发的性质，例如里昂纺织工人的起义就是这样。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也只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

这个时期是唯一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准备和诞生的时期。这个时期几乎包括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二的年代，当这个时期结束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一切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形式已宣告破产（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工人阶级已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而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历史道路。

第二个时期是大批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发展和成熟的时期。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空前发展，无产阶级为实现自己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而在各个方面所作的全面准备，——这些都是这个时期的特点。紧

接着的第三个时期就是最近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准备好了的力量定会在許多危机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奥古斯特·倍倍尔本身是工人，他通过頑强的斗争使自己树立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把自己全部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用来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数十年来他一直同日益成长和壮大的德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他成了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成了国际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

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倍倍尔诞生于莱茵河畔科伦城的一个贫穷的普鲁士士官的家里。还在幼年时代，他就接受了不少荒谬的偏见，直到后来才逐渐地永远地把它抛弃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即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莱茵河畔的居民都向往共和政体。在国民学校里只有两个男孩（倍倍尔是其中的一个）拥护君主政体，他们因此遭到同学们的殴打。倍倍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童年时代的这件事时，曾得出了一句“格言”，如果把它译成俄语，大意是这样：“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

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反革命年代以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春天”，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拉萨尔开始了他出色的、但为时不久的鼓动工作。这时，倍倍尔还是年轻的旋工助手，他贪婪地读着一八四八年的老活动家出版的自由主义报纸，并且成为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参加者。倍倍尔摆脱了普鲁士兵营的偏见，逐渐接近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反对社会主义。

但是生活毕竟起了作用，尽管当时在德国由于十多年的反革命压迫而很难读到马克思的著作，但年轻的工人从阅读拉萨尔的小册子中逐渐接触到马克思。工人生活的条件，以及对社会科学

的認真严肃的研究，促使倍倍尔倾向于社会主义。他自己是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李卜克内西（比倍倍尔大十四岁，这时刚从伦敦迁回国内）的帮助更加速了他的这种发展。

当时馬克思的敌人散布了一些恶毒的流言，說馬克思的党由三个人組成：党的首領是馬克思，他的秘书是恩格斯，他的“代理人”是李卜克内西。尽管某些笨蛋畏避李卜克内西这个侨民“代理人”，但倍倍尔却能够从李卜克内西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找到同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伟大主张的生动联系，找到同当时建立起来的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生动联系，找到馬克思主义观点和馬克思主义传统的活生生的代表者。据说，年轻的施工倍倍尔是这样評論李卜克内西的：“在这个人身上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在六十年代的后半期，倍倍尔断絕了同自由派的联系，把工人联合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中分离出来，并同李卜克内西一起站在爱森納赫派，即馬克思主义者的派別的最前列，这个派別同另一个工人的派別即拉薩尔派作了多年的斗争。

德国社会主义分裂的历史原因，简单說来可归結为下面这一点。当时德国統一的問題已經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当时的阶级对比关系下，这种統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即或者通过革命，或者通过普魯士王朝的战争。通过革命，就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建立全德共和国；通过普魯士王朝的战争，就是巩固普魯士地主在統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

拉薩尔和拉薩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就实行了动摇的政策，迁就俾斯麦的容克地主领导权。他們的錯誤就在于使工人政党倾向于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贯地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反对向暴虐的普魯士国家制度、俾斯麦精神和民族主义

做任何微小的让步。

虽然德国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了，但是历史证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正确的。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策略，只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只有他们在统一德国和“自上而下”革新德国问题上所抱的不调和态度，才能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而当时的問題也正在于党的基础。

如果說，拉薩尔派向俾斯麦精神献媚或对它“迁就”而沒有給德国工人运动带来危害，那只是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这些企图作了最有力、最猛烈的反击。

当問題已在历史上获得解决，德意志帝国建立五年以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把两个工人政党统一起来，并保证馬克思主义在统一的党内的领导地位。

从德国国会成立时起，倍倍尔就当选为国會議員，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德国（以及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策略原則就是对敌人不作絲毫让步，不放过爭取工人生活改善即使是很小的改善的任何机会，同时原則上絕不調和，始終力求实现最終目的，这个政策的原則是由倍倍尔本人或在他直接参加和领导下制定的。

按照俾斯麦精神统一起来的、按照普魯士方式和容克意旨加以革新的德国，用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来对付工人政党的成就。工人阶级政党的合法地位被取消了，它被宣布为非法組織。困难的时期到来了。当时除了敌人的迫害以外，还有内部危机，即在一些主要策略問題上表现了动摇。机会主义者重新抬头，他們因失去合法地位而惊惶失措，并开始唱起哀歌来，他們叫喊要放弃不折不扣的口号，責备自己走得太远了，等等。应当指出，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赫希柏格，在党还很薄弱还不能立即站稳脚跟

的时候，他曾經在財政上帮助过党。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猛烈地反对了可耻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这时倍倍尔显示出了自己是党的真正領袖。他及时地看出了危险性，認識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是正确的，因而把党引上了进行不調和的斗争的道路。当时创办了秘密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該报最初在苏黎世出版，后来迁往伦敦，每周运送到德国，它拥有一万个訂戶。机会主义的动摇被彻底消除了。

当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由于人們对杜林的迷恋而产生了另一种动摇。倍倍尔也曾一度被杜林所迷惑。以“左派”面目出現的杜林的拥护者們（其中最突出的是莫斯特）很快就滾到无政府主义立場上去。恩格斯对杜林的理論提出的尖銳的致命的批判，遭到許多党組織的反对，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建議不許中央机关报再登載这种批評。

但是一切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者（当然，他們的首領是倍倍尔）很快就認識到各种“新”理論的全部腐朽性，并与这些理論和一切无政府主义的企图一刀两断。党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领导下，学会了把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結合起来。当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投票贊同撥款補助輪船公司这个重大問題上大多数站在机会主义立場时，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就起来反对党团，經過四个星期的斗争，終於取得了胜利。

一八九〇年，施行了十二年的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废除了。这时再次出現了其性质与七十年代中期相类似的党内危机。一方面，以福尔馬尔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准备利用合法性来抛弃不折不扣的口号和不調和的策略；另一方面，所謂“青年派”則玩弄“左派”儿戏并滾到无政府主义立場上去。这次党内危机所以历时很短，而且并不严重，应当說，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是有莫大功劳的，因为他們給予了两方面的动摇以最坚决的反击。

党开始了广泛而深入地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在政治组织内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内发展起来。身为国会议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倍倍尔，在所有这些方面所进行的巨大的实际工作是难以计算的。正是由于进行了这些工作，使倍倍尔无可争辩地被公认为与工人群众最亲近最受工人群众爱戴的党的领袖。

德国党内的最近一次危机就是所谓“伯恩施坦主义”，对于这次危机倍倍尔也采取了最积极的行动。曾经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在十九世纪末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的政党被企图变成实行社会改良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新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的官僚中和在知识分子中找到了很多拥护者。

倍倍尔拿出全副精力来反对这种思潮，他表达了工人群众的情绪和他们一定要为实现不折不扣的口号而斗争的坚强信心。他在汉诺威和德勒斯顿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演说，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准备和集合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经的阶段。没有一个人象奥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工人，他能够树立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能够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他能够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为争取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所进行的群众斗争中的代表人物和参加者的典范。

原载《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第290—296页。

目 录

序 言.....	1
第二版序言	3
童年和青年时期	5
学艺和漫游时期	21
回到維茨拉及以后	36
我参加了工入运动和社会生活	40
拉薩尔的登場及其后果	61
各个德意志工入协会的联合大会	67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80
新的社会现象	82
斯图加特的联合大会	91
威廉·李卜克内西	101
工人协会中日益高涨的憤慨	106
一八六六年的灾祸	110
战 后.....	134
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进一步发展.....	140
个人私事	147
向紐伦堡前进	151
工会运动	166
我的第一次判罪	178
巴門—爱北斐特代表大会以前	180

序 言

15

在党內的我的許多同志希望我写一部回忆录，这正合我的心願。既然像我这样的人由于环境的恩賜而取得了富有影响的地位，那么一般人也有权利来了解达到这个地位的情况。还有常常加到我身上的大量的虛伪指責和歪曲批評，也使我认为有理由把真情实况告知大家。

为了这个目的，首先需要坦白和真誠，否則，把一个人的生平公之于世，就沒有意义了。我的回忆录的讀者，不論他站在哪方面或者属于哪个党派，决不能指責我，說我有所隱瞞或是有所粉飾。我說的是真实情况，即使有的地方，一些人以为我若不談出来还要好些。那种見解我不贊同。沒有不犯錯誤的人，自己承认一个錯誤，往往会使讀者非常感到兴趣并最能使讀者作出正确的評價。

我既然要尽可能写得真实，那就不能依賴我的記憶。記憶在过了一些年后消失了，甚至有些給人印象很深的事件，在若干年里，在各种各样的影响之下也会完全变样。我不仅常从我自己方面，而且常从別人方面得到这种經驗。我許多次在熟人和朋友中間誠心誠意地讲述往年的事件，可是到了后来，例如找到了在事件的直接影响下写出来的信件，所讲述的事件却显得完全不同。这使我有这样的看法：法官在一件事故已过几年之后不應該听取证人的誓詞。作伪誓的危險性是很大的。

我尽可能地利用了信件、筆記、文件等等，以便确证我的叙述以及我在一定时期的看法的正确性。

16

但在我的生活的某些时期，如果我不想作别人或自己的告密人，保存信件是会发生危险的。这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统治时期特别是如此，这时我每时每刻都有被抄家或搜身的危险，不管这种搜查是为了想获得控诉我的材料还是为了获得控诉别人的材料。我有很长时期被警察和检察官认为是不可太信任的危险分子。这也許不无道理。由于同样理由，我也禁止自己記日記。

在这里所发表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前一世紀六十年代反社会主义的工人协会的东西里，包括着迄今只有部分地为人所知的材料。自从去年十月底 L. 宗納曼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逝世以后，除我以外，不再有人对当时的史实有如我这样的認識和亲身經歷，并掌握这个材料。我曾希望，我能像以往那样繼續进行这个工作。但是使我差不多两年之久不能胜任任何紧张的腦力劳动的疾病，不許我这样做。只要能保持必要的健康，則在第一卷以后不太长的時間內就会有第二卷，也許还有第三卷問世。

柏林，宜尼堡，一九一〇年新年

奥·倍倍尔

第二版序言

我的书在銷售七万册后，需要再版，我除作了許多更正以外，还在正文中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补充；因为我最近得到的信件和資料促使我来做这些补充。

我还要說明的是，我的回忆录的第二卷也将同第一卷的第二版一同出版。

苏黎世，一九一一年六月

奥·倍倍尔

